

# 儒家文化、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

刘铠豪 王雪芳

**摘要:** 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基于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各城市孔庙数量、清代进士人数和儒家书院数量等指标互为补充地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系统探究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与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提升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儒家文化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家国情怀促进了家庭社会捐赠。(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4)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贫富差距大会强化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而邻里效应和对外开放程度弱化了这一促进作用。(5)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促进了共同富裕。因此,应当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积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积极孵化培育慈善组织和不断提升医疗保险覆盖率。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家庭社会捐赠; 共同富裕

**DOI:** 10.19836/j.cnki.37-1100/c.2024.02.003

## 一、引言

收入分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强调“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sup>①</sup>。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sup>②</sup>。第三次分配作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一种新的补充形式,被喻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温柔之手”,已成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慈善是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公益活动,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正在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因此,探究慈善捐赠行为背后的潜在影响因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近年来,非正式制度因素的治理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文化属于非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出口扩张与健康:理论分析与中国经验”(71903111);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重大项目“数字经济促进山东省制造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及政策研究”(2023RZA02015);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环境规制政策能否助力‘健康中国·健康山东’?——来自‘两控区’政策的证据”(19CQXJ16);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团队计划”团队(2022RW002)。

**作者简介:** 刘铠豪,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自贸区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cashhall@163.com);王雪芳(通讯作者),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wxuefang@126.com)。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08/17/content_5631780.htm), 访问日期: 2023年12月30日。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正式制度的范畴,与政治、法律等正式制度以互补的方式相互影响和共同演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sup>①</sup>。在中国社会,儒家文化是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的传统文化符号<sup>②</sup>,它是个体和组织普遍尊崇的道德规范与行为指南<sup>③</sup>,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那么,儒家文化是慈善捐赠行为的潜在影响因素吗?探讨该话题对于推动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其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公司经营地的儒家文化越浓厚,企业慈善捐赠越积极,这表明现代儒家文化依然保有传统儒学中利他主义的部分,且对企业捐赠行为存在重要影响<sup>④</sup>。那么,儒家文化能否同样促进家庭社会捐赠呢?其影响路径和渠道有哪些?两者之间的关系存在怎样的异质性特征,又会受到哪些因素的调节?儒家文化能否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这些问题都需要予以厘清并解答。

现有关于儒家文化对家庭经济决策影响作用的文献,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聚焦于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Chen等人<sup>⑤</sup>的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中的养儿防老观念降低了家庭的储蓄率;而张诚等<sup>⑥</sup>却发现,地区儒家文化氛围显著提高了家庭储蓄率水平。另一类聚焦于儒家文化对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影响。儒家文化观念会显著降低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度<sup>⑦</sup>,这与杜朝运和詹应斌<sup>⑧</sup>、潘文东等<sup>⑨</sup>的结论一致,即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的地区,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可能性越低;而陈刚等<sup>⑩</sup>却指出,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家庭投资风险资产的概率。由此,儒家文化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作用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1)基于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和家庭社会捐赠规模的双重视角,首次系统地证实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并揭示了儒家文化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三个有效路径。(2)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家庭配置风险资产的影响作用,而本文从家庭社会捐赠(包括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和家庭社会捐赠规模)这一独特视角对“儒家文化对家庭经济决策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拓展和补充。(3)证实了儒家文化既促进了家庭社会捐赠又缩小了收入差距,揭示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儒家文化助力慈善发展”的重要性。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方面,“仁”是儒家思想的基石,为儒家慈善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仁”的本质即为“爱人”,并提出了仁爱之说。“仁者爱人”传递出了推己及人、乐善好施的助人精神。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并提出四端之心: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这四种善端是引导人们扬善抑恶、布善祛恶的力量之源<sup>⑪</sup>。“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体现出了对他人怀有“恻隐之心”是人的本能,而这一慈悲情怀

① Alesina A., Giuliano P.,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5, 53(4), pp. 898-944.

② 李万利、徐细雄、陈西婵:《儒家文化与企业现金持有——中国企业“高持现”的文化内因及经济后果》,《经济动态》2021年第1期。

③ Ip P. K., “Is Confucianism Good for Business Ethic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 88(3), pp. 463-476.

④ 陆伦藏、周冬华:《现代儒家文化与企业捐赠:基于利他主义视角》,《财务研究》2020年第6期。

⑤ Chen Y. J., Chen Z., He S., “Social Norms and Househol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Review of Finance*, 2019, 23(5), pp. 961-991.

⑥ 张诚、刘瑜、尹志超:《儒家文化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⑦ 闫竹、王骛然:《儒家文化与中国家庭股票市场参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2期。

⑧ 杜朝运、詹应斌:《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6期。

⑨ 潘文东、李万利、汤旭东:《儒家文化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风险偏好和生育意愿双重视角的研究》,《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12期。

⑩ 陈刚、王燕飞、何丽:《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配置》,《财贸经济》2022年第1期。

⑪ 周秋光、曾桂林:《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

正是人们进行社会捐赠的内在动力。当看到他人遭受困境时,人们会自然地伸出援助之手,关怀同胞的痛苦和遭遇。因此,在儒家仁爱观的影响下,人们更容易对需要帮助的人怀有恻隐之心,并通过社会捐赠对其提供关怀和帮助。

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义利观也蕴含着丰富的慈善思想。“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说明君子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先义后利,在义与利之间坚守本心。“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体现出儒家思想内含为道义献身的精神。这种献身精神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当道义与利益发生冲突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们通常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重义轻利、慷慨解囊,致力于扶贫济困的慈善事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儒家文化有助于促进家庭社会捐赠。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幸福感主要来自于仁爱等个人的美德特征<sup>①</sup>。儒家文化十分注重培养人的仁爱精神,“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仁者不忧”(《论语·子罕》),皆传递出只有仁者才可以保持快乐的思想。而“乐”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多代表一种心理体验,是一种基于经验的、内在的幸福感<sup>②</sup>。因此,儒家文化能够通过培养人们的“仁爱”之情,对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现有研究表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其进行慈善捐赠的概率越高<sup>③</sup>,也越会为社区付出更多的时间和金钱<sup>④</sup>,即主观幸福感在促进个体进行社会捐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主观幸福感是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的潜在渠道。

儒家文化通过多种路径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首先,儒家文化强调以和为贵,提倡与人为善,如“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现有研究基于不同的群体证实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满意度<sup>⑤⑥</sup>。因此,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人们能够以更加宽容大度的心态应对人际关系矛盾,这有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其次,儒家文化强调克己复礼,倡导节制自己的欲望,反对纵欲和贪欲,如“欲而不贪”(《论语·尧曰》)“欲不可从(纵)”(《礼记·曲礼》)。这有助于人们形成知足常乐的思想,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再次,儒家文化主张勤俭节约,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诫子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而自愿简单的生活方式能够对生活满意度产生积极的影响<sup>⑦⑧</sup>。现有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有动力进行捐赠,其捐赠的概率就越高<sup>⑨</sup>。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生活满意度是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的潜在路径。

儒家文化体系中还蕴含着浓厚的家国情怀。古往今来,无数儒学弟子致力于国计民生大业,为国为民积极承担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

① Seligman M. E. P., Csikszentmihalyi M., “Positive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pp. 5-14.

② 曾红、郭斯萍:《“乐”——中国人的主观幸福感与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心理学报》2012年第7期。

③ Schupp J., Priller 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and Blood Donors in Germany”, *DIW Economic Bulletin*, 2011, 1(6), pp. 23-30.

④ Diener E., Tay L., “A Scientific Review of the Remarkable Benefits of Happiness for Successful and Healthy Living”, *Happiness: Transforming the Development Landscape*, 2017, pp. 90-117.

⑤ 陈云、周昊:《北京市城镇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研究》,《人口与发展》2021年第2期。

⑥ 刘冰冰、刘晓梅:《积极老龄化背景下人际关系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21年第5期。

⑦ Boujbel L., d’Astous A., “Voluntary Simplicity and Life Satisfaction: Explor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sumption Desires”, *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 2012, 11(6), pp. 487-494.

⑧ Rich S. A., Hanna S., Wright B. J., “Simply Satisfied: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Need Satisfaction in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Voluntary Simplifier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7, 18(1), pp. 89-105.

⑨ 朱颖:《生活满意度与个人捐赠行为研究——基于上海大都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关心”,正是仁人志士生动的内心写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在面临困难时,中国人总能团结一致,舍小家为大家,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携手并进,彰显了深厚的同胞情义和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人们会秉承着家国情怀,甘于奉献自我,积极服务社会,并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的潜在渠道。

现有研究表明,慈善事业作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运行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sup>①</sup>。慈善事业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社会价值力量,是化解贫富冲突的“润滑剂”<sup>②</sup>。发展慈善事业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与救助,有助于推动资源和财富流向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sup>③</sup>。因此,慈善事业成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是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sup>④</sup>。此外,儒家文化也蕴含着有关缩小收入差距的理论思想,正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与孔子主张的财富均分,反对贫富悬殊有关<sup>⑤</sup>。孔子曰:“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即儒家文化反对贫富悬殊,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建立在财富分配公平的基础上。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在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的过程中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5: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进而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 三、研究设计

#### (一)数据来源

1. 微观家户数据:本文采用了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共计六期的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利用微观家户数据和与之相匹配的各城市儒家文化相关数据、城市层面的经济社会指标,从微观家户角度探究儒家文化对于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本文选取熟悉家庭财务情况的“财务回答人”作为代理户主并将家庭经济库与成人库进行匹配,并保留年龄大于16周岁的户主。

2. 儒家文化相关数据:(1)自唐代以来各城市历史和现存孔庙数量,孔庙数据来自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各地方志以及百度百科等网站。(2)各城市清代进士人数来自《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sup>⑥</sup>。(3)各城市儒家书院的数量来自《中国书院辞典》<sup>⑦</sup>及各地方教育志。

3. 城市层面的数据:相关指标主要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宗教地图集》以及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公告等。

#### (二)指标说明

1. 被解释变量:家庭社会捐赠。参照周晓剑和武翰涛<sup>⑧</sup>的做法,本文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家庭社会捐赠:一是家庭是否参与社会捐赠(*Donate\_dum*),用以衡量家庭社会捐赠的倾向;二是家庭社会捐赠

① 吕鑫:《推动慈善事业在实现共同富裕中发挥更大作用》,《光明日报》2021年11月20日,第11版。

② 郑功成、王海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2022年9期。

③ 韩文龙、唐湘:《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进路》,《经济纵横》2022第4期。

④ 张奇林:《共同富裕目标下慈善事业的使命担当与发展路径》,《社会保障评论》2023年第3期。

⑤ 周秋光、曾桂林:《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

⑥ 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⑦ 季啸风:《中国书院辞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⑧ 周晓剑、武翰涛:《家庭禀赋、邻里效应与捐赠动机——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社会保障评论》2019年第4期。

金额(*Donate\_sum*),用以衡量家庭社会捐赠的规模。具体而言,对于2010年CFPS家庭问卷中的问题“去年,您家是否给机构/个人捐赠过钱物?”,如果回答是,则定义家庭社会捐赠的倾向取值为1,否则为0;对于2010年CFPS家庭问卷中的问题“请问,去年捐赠的钱物总价值约合多少元?”,采用受访家庭回答的总价值金额来衡量家庭社会捐赠的规模。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的CFPS家庭问卷中只询问了“过去一年,您家社会捐助支出(包括现金和实物,如食品、衣服等)是多少?”,依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如下定义:若过去一年家庭社会捐助支出为0元,则定义家庭社会捐赠的倾向取值为0;若家庭社会捐助支出大于0元,则定义家庭社会捐赠的倾向取值为1,并采用家庭社会捐助支出金额来衡量家庭社会捐赠的规模。

2.核心解释变量:儒家文化。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各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程度,本文使用了各城市孔庙数量(*Confu\_temple*)、清代进士人数(*Qing\_scholar*)、儒家书院数量(*Confu\_academy*)三种测度方式互为补充。选取依据如下:(1)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为了推崇儒学,太宗下诏天下州、县皆立孔庙,即“州县莫不有学,则凡学莫不有先圣之庙矣”。孔庙是象征儒家文化的核心建筑,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行为习惯。鉴于此,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sup>①②</sup>,将自唐代以来各城市历史和现存孔庙数量作为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的指标之一。(2)隋唐时期,以考察儒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正式确立。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选拔需要经过童试、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通过会试和殿试的考生统称为进士。进士作为科举制的最高等级,体现了各地区考生对儒家文化的深刻掌握和运用<sup>③</sup>,同时也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载体。本文采用各城市清代进士人数作为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的指标之一<sup>④</sup>。(3)书院作为聚徒讲授、学问交流和书籍收藏的重要场所,是传播儒学知识的重要载体之一,能够很好地反映各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程度。基于此,本文采用各城市儒家书院数量作为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的指标之一<sup>⑤</sup>。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户主的性别(*gender*)、年龄(*age*)、是否加入宗教/信仰团体(*religion*)、受教育程度(*education*)、政治面貌(*party*)、户籍身份(*hukou*)和自评的本地社会地位(*social\_status*);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家庭规模(*familysize*)、家庭现金及存款总值(*savings*)和家庭是否有完全自有住房(*house*)<sup>⑥⑦</sup>。

### (三)模型构建

由于家庭社会捐赠倾向是二值选择变量,所以本文采用如下Probit模型作为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以探究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倾向的影响作用。本文计算和汇报的均是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

$$Prob(Donate\_dum_{ijt} = 1) = \Phi(\alpha_1 + \beta_1 Confucian_j + \gamma_1 Controls_{it} + \eta_p + \lambda_t + \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i*代表家庭,*j*代表家庭所在城市,*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Donate\_dum<sub>ijt</sub>*衡量*j*城市的家庭*i*在*t*年的家庭社会捐赠倾向,*Confucian<sub>j</sub>*是家庭*i*所在城市*j*的儒家文化浓厚程度,分别采用各城市孔庙数量(*Confu\_temple*)、清代进士人数(*Qing\_scholar*)、儒家书院数量(*Confu\_academy*)来衡量;*Controls<sub>it</sub>*

① Kung J. K., Ma C.,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4, 111, pp. 132-149.

② 才国伟、谢佳松:《儒家文化传统与当代企业创新》,《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③ Chen T., Kung J. K., Ma C., “Long Live Keju! The Persistent Effects of China’s Civil Examination System”, *The Economic Journal*, 2020, 130(631), pp. 2030-2064.

④ 潘越、汤旭东、宁博:《俭以养德:儒家文化与高管在职消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⑤ 涂未宇、徐细雄、刘曼:《儒家传统与员工雇佣保障:文化的力量》,《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

⑥ 晏艳阳、邓嘉宜、文丹艳:《邻里效应对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经济动态》2017年第2期。

⑦ 文雯:《中国居民捐款收入弹性测度与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表示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其他因素,包括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此外,本文还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 $\eta_p$ <sup>①</sup>、年份固定效应 $\lambda_t$ , $\alpha_1$ 为常数项, $\epsilon_{ijt}$ 为误差项。

对于家庭社会捐赠规模这一连续变量,由于存在大量为0的情况,其数据特征为左断尾分布的“归并数据”,因而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y^* = \alpha_2 + \beta_2 Confucian_j + \gamma_2 Controls_{it} + \eta_p + \lambda_t + \epsilon_{ijt} \quad Y = \max(0, y^*) \quad (2)$$

其中, $y^*$ 为潜变量,对应的 $Y$ 为家庭社会捐赠规模 $Donate\_sum$ ,其余变量定义与公式(1)相同。

## 四、实证分析

### (一)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Panel A汇报了不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Panel B汇报了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一方面,第(1)(3)(5)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即显著提高了家庭进行社会捐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第(2)(4)(6)列的估计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地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即显著提高了家庭进行社会捐赠的支出金额。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提升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验证了假说1。

表1 基准回归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1)	(2)	(3)	(4)	(5)	(6)
Panel A						
<i>Confu_temple</i>	0.00698*** (3.8531)	0.00085*** (2.8085)				
<i>Qing_scholar</i>			0.00009*** (3.2757)	0.00001*** (2.8949)		
<i>Confu_academy</i>					0.00031** (2.0851)	0.00005** (2.2708)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9863	59747	59863	59747	59863	59747
Panel B						
<i>Confu_temple</i>	0.00706*** (4.2245)	0.00089*** (2.9748)				
<i>Qing_scholar</i>			0.00008*** (3.0838)	0.00001*** (2.8979)		
<i>Confu_academy</i>					0.00032** (2.3038)	0.00006** (2.490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儒家文化)的衡量指标均为非时变变量,是各个样本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特征。如果在回归中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的话,那么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会被城市固定效应吸收掉。因此,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更高层次的地区固定效应——省份固定效应。

续表 1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1)	(2)	(3)	(4)	(5)	(6)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4673	54582	54673	54582	54673	54582

注:(1)Probit和Tobit模型汇报的估计均为直接回归之后进一步测算的边际效应(不含常数项);(2)所有回归均采用稳健标准误;(3)\*\*\*、\*\*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或z值。下同。

## (二)稳健性检验<sup>①</sup>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1)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sup>②③</sup>,以各城市孔庙数量、清代进士人数和儒家书院数量分别除以各城市行政区域面积所得到的孔庙密度(*density\_temple*)、清代进士密度(*density\_scholar*)和儒家书院密度(*density\_academy*)来衡量当地的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结果表明,在替换指标后,估计结果较为稳健。(2)借鉴Du<sup>④</sup>的做法,本文以各城市到历史上七个儒学中心<sup>⑤</sup>的平均球面直线距离(*distance\_7*)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由于距离七个儒学中心的平均距离越小,家庭所在城市的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所以*distance\_7*估计系数的符号应当相反。结果表明,将*distance\_7*作为替换指标后,回归系数确实显著为负,估计结果依旧稳健。

2. 控制当地其他文化特质的潜在影响。自汉武帝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来,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历史上儒家文化也曾受到来自佛教和道教文化的冲击<sup>⑥</sup>。根据文化冲突理论,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在发生碰撞时,会出现相互竞争和冲突,这可能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相互融合,也可能造成文化之间相互替代,无论是哪种结果,佛教和道教文化都可能会削弱儒家文化的作用。借鉴现有研究<sup>⑦⑧</sup>,本文采用家庭所在城市的佛寺(*Buddhism*)、道观(*Daoism*)、基督教教堂(*Protestant*)、天主教教堂(*Catholicism*)和伊斯兰教教堂(*Islam*)的数量来衡量当地其他文化特质,并将其引入回归以控制其潜在干扰。结果表明,在控制当地其他文化特质后,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和家庭社会捐赠规模的边际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3. 更换样本。一方面,《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中记载的清朝八旗士子中榜进士多为旗籍,而旗籍士子的籍贯地无法与我国当前的行政区划相匹配。另一方面,吉林地区士人在本地参加生员科举考试始于嘉庆五年(1800年),黑龙江地区则迟至光绪六年(1880年)<sup>⑨</sup>。因此,使用清代进士人数可能无法准确衡量儒家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影响程度。参照陈刚和邱丹琪<sup>⑩</sup>的思路和方法,本文基于剔除东北三省后的子样本重新回归,估计结果仍旧非常稳健。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稳健性检验”部分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② 王正位、李耕:《科举制传统和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经济学报》2021年第3期。

③ 陈刚、王燕飞、何丽:《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财贸经济》2022年第1期。

④ Du X., “Does Confucianism Reduce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5, 132(4), pp. 661-716.

⑤ 历史上七个儒学中心为山东曲阜、四川成都、河南洛阳、福建三明和龙岩、江苏东台、浙东、江西临川。

⑥ 洪修平、孙亦平:《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的东方哲学与宗教》,《哲学动态》2019年第8期。

⑦ 李万利、徐细雄、陈西婵:《儒家文化与企业现金持有——中国企业“高持现”的文化内因及经济后果》,《经济动态》2021年第1期。

⑧ 陈刚、王燕飞、何丽:《儒家文化与家庭风险资产投资》,《财贸经济》2022年第1期。

⑨ 张杰:《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科举进士家族》,《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

⑩ 陈刚、邱丹琪:《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一项流行病学研究》,《财经研究》2021年第3期。

4. 工具变量法。为了更好地识别两者关系,避免遗漏变量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sup>①②</sup>,选取各城市到最近官办书局<sup>③</sup>的距离(*Min\_distance*)和各城市贞节牌坊的数量(*CMA*)作为家庭所在城市儒家文化氛围的工具变量,进行IVprobit回归和IVtobit回归。若某地越接近官办书局,书籍运输成本越小,当地居民获取书籍越便利,儒家经典文献就越容易被广泛传播,进而当地的儒学文化氛围会更加浓厚,且当前各城市距离官办书局的远近与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并没有直接联系。贞节牌坊为旌表贞洁烈女守节而立,是儒家思想理学教化下的产物<sup>④</sup>,且不会直接影响当前家庭社会捐赠行为。工具变量法得到的估计结果依旧稳健。

5. 安慰剂检验。尽管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加入了可能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控制变量,但是受数据所限,仍然可能存在其他无法观测的影响因素。为了排除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受到其他非观测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还令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冲击变得随机,并重复随机过程500次,估计系数的概率密度分布图显示,随机处理的估计值集中分布在零附近,基准估计结果远位于整个分布之外,间接证明了不存在其他随机因素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

(三)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

1. 主观幸福感。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儒家文化是否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中介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CFPS成人问卷中“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这一问题<sup>⑤</sup>,受访者根据自身的幸福感受进行回答,回答范围为0—10分(数值越大,代表幸福感越强),我们采用户主的主观幸福感(*Happiness*)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第(1)—(3)列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户主的主观幸福感,第(4)—(9)列表明户主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显著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因此,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促进家庭社会捐赠,说明主观幸福感是儒家文化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路径之一,验证了假说2。

表2 影响机制:主观幸福感

	<i>Happiness</i>	<i>Happiness</i>	<i>Happiness</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i>Donate_dum</i>	<i>Donate_sum</i>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1)	(2)	(3)	(4)	(5)	(6)	(7)	(8)	(9)
<i>Confu_temple</i>	0.01707*** (3.2297)			0.00645*** (3.2981)	0.00097*** (2.6206)				
<i>Qing_scholar</i>		0.00032*** (3.9993)				0.00005* (1.8223)	0.00001** (1.9683)		
<i>Confu_academy</i>			0.00174*** (3.9722)					0.00041** (2.5012)	0.00008** (2.4629)
<i>Happiness</i>				0.00530*** (4.8913)	0.00073*** (3.8399)	0.00532*** (4.9073)	0.00073*** (3.8393)	0.00530*** (4.8870)	0.00073*** (3.834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4717	34717	34717	34717	34626	34717	34626	34717	34626

① 徐细雄、李万利:《儒家传统与企业创新:文化的力量》,《金融研究》2019年第9期。  
 ② 潘越、汤旭东、宁博:《俭以养德:儒家文化与高管在职消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③ 官办书局的信息来自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④ 潘爱玲、王慧、邱金龙:《儒家文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会计研究》2021年第5期。  
 ⑤ 由于2010年CFPS成人问卷“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这一问题的答案取值为1—5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幸,“5”表示非常幸福),与2014—2020年CFPS成人问卷“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这一问题的答案范围(取值为0—10)设置不同,因此,对于2010年CFPS成人问卷中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回答的数值乘以2。

2. 生活满意度。本文试图探讨儒家文化是否通过影响生活满意程度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中介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CFPS成人问卷中“您对自己生活的满意程度?”这一问题,受访者根据自身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进行回答,回答范围为1—5分(数值越大,代表对生活的满意程度越高),我们采用户主的生活满意度(*Satisfaction*)进行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1)—(3)列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户主的生活满意度,第(4)—(9)列表明户主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因此,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提高生活满意度促进家庭社会捐赠,说明生活满意度是儒家文化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路径之一,验证了假说3。

表3 影响机制:生活满意度

	<i>Satisfaction</i>	<i>Satisfaction</i>	<i>Satisfaction</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1)	(2)	(3)	(4)	(5)	(6)	(7)	(8)	(9)
<i>Confu_temple</i>	0.01490*** (3.2758)			0.00699*** (4.1817)	0.00088*** (2.9579)				
<i>Qing_scholar</i>		0.00024*** (3.6268)				0.00007*** (3.0454)	0.00001*** (2.8706)		
<i>Confu_</i> <i>academy</i>			0.00127*** (3.4779)					0.00031** (2.2177)	0.00005** (2.4413)
<i>Satisfaction</i>				0.00638*** (3.4362)	0.00104*** (3.1535)	0.00637*** (3.4351)	0.00103*** (3.1401)	0.00641*** (3.4558)	0.00104*** (3.148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4642	54642	54642	54642	54551	54642	54551	54642	54551

3. 家国情怀。本文试图探讨儒家文化是否通过影响家国情怀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现有研究表明,关注时事新闻是家国情怀的一种外在化表现<sup>①</sup>,即具有家国情怀的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密切关注国家和社会的时事新闻,关心民生福祉,表现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的胸怀和社会责任感,因此,本文选取的代理指标为“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Care*)”<sup>②</sup>。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第(1)—(3)列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升了户主的家国情怀,第(4)—(9)列表明户主家国情怀的提升显著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因此,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提升家国情怀促进家庭社会捐赠,说明家国情怀是儒家文化影响家庭社会捐赠的路径之一,验证了假说4。

① 王朴:《以热点新闻涵育学生的家国情怀》,《中国教育学刊》2018年第10期。

② 历年CFPS成人问卷内容存在一定的差异,为了尽可能保持研究样本的一致性,本文将“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Care*)”这一指标定义如下:(1)对于2010年CFPS成人问卷中“您是否关注下列新闻?”这一问题,受访者如果对“反腐倡廉、法制新闻、国际新闻、经济新闻、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农业/农村、社会问题、环境保护”方面的新闻内容从不关注,则将“对时事的关注度(*Care*)”赋值为0,否则为1;(2)对于2014—2020年CFPS成人问卷中“您在过去一周有几天通过电视台新闻了解政治信息?”和“您在过去一周有几天通过网络新闻了解政治信息?”这两个问题,若受访者的回复为0天,则将“对时事新闻的关注度(*Care*)”赋值为0,否则为1。

表4 影响机制:家国情怀

	<i>Care</i>	<i>Care</i>	<i>Care</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i>Donate_</i> <i>dum</i>	<i>Donate_</i> <i>sum</i>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Probit	Tobit
	(1)	(2)	(3)	(4)	(5)	(6)	(7)	(8)	(9)
<i>Confu_temple</i>	0.00337** (2.2032)			0.00533*** (2.7971)	0.00082** (2.4666)				
<i>Qing_scholar</i>		0.00007*** (2.7213)				0.00006* (1.9550)	0.00001** (2.1588)		
<i>Confu_</i> <i>academy</i>			0.00049*** (3.8485)					0.00036** (2.2396)	0.00007** (2.4463)
<i>Care</i>				0.05856*** (9.3299)	0.00887*** (3.5988)	0.05861*** (9.3357)	0.00887*** (3.5981)	0.05846*** (9.3126)	0.00884*** (3.5925)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38524	38524	38524	38524	38434	38524	38434	38524	38434

(四)异质性检验<sup>①</sup>

1. 方言片个数较多地区与方言片个数较少地区。本文使用方言片个数来衡量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程度<sup>②</sup>,并基于方言片个数的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方言片个数较多地区,方言片个数较少地区的儒家文化更显著地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究其原因,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讲,区域内的语言集中度越高,人们之间的相似度就越高,社会信任水平也越高<sup>③</sup>。而社会捐赠需要依靠社会信任维系,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区域,社会捐赠水平也就越高<sup>④</sup>。在方言片数较少地区,人们的文化背景差异相对较少,沟通渠道相对畅通,信任障碍更容易被消除,较高的社会信任度为家庭进行社会捐赠提供了环境基础,家庭更易于相信所获信息(如寻求帮助者的个人实际情况)的真实性,从而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更容易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本文采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机构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各城市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并根据其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和社会捐赠规模的影响作用相对更大。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平滑消费曲线,降低居民流动性约束<sup>⑤</sup>。在流动性约束相对宽松的情况下,儒家文化蕴含的“利他”“仁爱”等伦理价值会更容易付诸实践,有助于家庭伸出援助之手。另一方面,普惠金融本质上是以信任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sup>⑥</sup>,所以,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信任度也相对较高。较高的社会信任度为家庭进行社会捐赠提供了环境基础,个人的“恻隐之心”更容易被激发。

3. 慈善基金会数量较多地区与慈善基金会数量较少地区。借鉴现有研究<sup>⑦</sup>,本文采用各城市慈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异质性检验”部分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② 徐现祥、刘毓芸、肖泽凯:《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2015年第2期。

③ 黄玖立、刘畅:《方言与社会信任》,《财经研究》2017年第7期。

④ 颜克高、井荣娟:《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基于2001—2013年省际数据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⑤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经济研究》2019年第8期。

⑥ 陈颐:《儒家文化、社会信任与普惠金融》,《财贸经济》2017年第4期。

⑦ 颜克高、井荣娟:《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基于2001—2013年省际数据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

善基金会的数量衡量政府对慈善组织的开放态度,并基于其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慈善基金会数量较少地区,慈善基金会数量较多地区的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和家庭社会捐赠规模的影响作用相对更大。究其原因,慈善的本质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在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越开放的地区,慈善基金会越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家庭也拥有更多的捐赠渠道,因而有助于把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潜在影响落到行动上,让“善念”变成“善举”。

4. 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转移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与以其他收入为主的家庭。现有研究表明,人们更偏好于把劳动所得捐出去,而非不劳而获的收入(如福利性收入)<sup>①</sup>。就不同收入结构的家庭而言,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呢?本文根据各种类型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将样本内的家庭划分为五类(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财产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转移性收入为主的家庭、以其他收入为主的家庭)。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于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以工资性收入为主的家庭和以经营性收入为主的家庭。可能的解释是:社会捐赠在家庭支出中的弹性较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更具有常规性和稳定性,能够持续增加家庭的经济资本并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进而有助于家庭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实现“达则兼济天下”。

5. 户主享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与户主不享有医疗或养老保险。现有研究表明,户主特征是影响家庭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sup>②</sup>。本文依据户主是否享有医疗或养老保险<sup>③</sup>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表明,相比于户主不享有医疗和养老保险的家庭,在户主享有医疗或养老保险的家庭中,儒家文化更显著地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究其原因,医疗保险保证参保者在生病时不会因病致贫返贫或因付不起医疗费陷入绝望,让参保者有所依靠,增加内心的安全感和主观幸福感<sup>④</sup>,养老保障在生命周期后期给予参保者稳定的收入和心理预期,降低了老年风险,这种预防性储蓄可以提高个体心理获得感和安全感<sup>⑤</sup>。参保者在权益得到保障后更容易受到儒家文化价值观念的引导,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时后顾之忧也较少。

#### (五)调节效应检验<sup>⑥</sup>

1. 贫富差距。如前文所述,儒家文化中蕴含着反对贫富悬殊、提倡财富合理分配的思想。那么当人们面临着较大的贫富差距时,儒家文化中反对“贫富悬殊”的思想能否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人们参与到济贫弱、助危困的慈善活动当中呢?借鉴现有研究<sup>⑦⑧</sup>,本文依据家庭人均纯收入测算出每个样本家庭的收入水平在当地的百分位数,选取第90个百分位数与第10个百分位数上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P90/P10)衡量当地的贫富悬殊程度,并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引入儒家文化与贫富差距的交互项。回归结果显示,儒家文化与贫富悬殊程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贫富差距越大越能强化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

① Brooks A. C., “Welfare Receipt and Private Charity”, *Public Budgeting & Finance*, 2002, 22(3), pp. 101-114.

② 董纪昌、刘晓亭、季康先等:《户主年龄、住房支付能力与家庭租购选择——基于CFPS的微观证据》,《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21年第8期。

③ 若户主享有“公费医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的一个或多个,则定义户主享有医疗保险,否则定义户主不享有医疗保险;若户主享有“离退休后从所在机关或事业单位领取离退休金、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老农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中的一个或多个,则定义户主享有养老保险,否则定义户主不享有养老保险。

④ 侯志阳:《社会保险能否让我们更幸福?——基于阶层认同的中介作用和公共服务绩效满意度的调节作用》,《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6期。

⑤ 倪志良、李琦:《养老保障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现代经济探讨》2021年第10期。

⑥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此部分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⑦ 尹志超、张号栋:《金融知识和中国家庭财富差距——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国际金融研究》2017年第10期。

⑧ 周利、廖婧琳、张浩:《数字普惠金融、信贷可得性与居民贫困减缓——来自中国家庭调查的微观证据》,《经济科学》2021年第1期。

2. 邻里效应。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往往是通过影响决策者的主观意识来激发人们的“恻隐之心”,进而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然而,家庭决策不仅受到内在价值理念的影响,还面临着社会规范的制约。现有研究表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中存在着同行效应(peer effect),并且该效应在“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促进作用”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面临较强的同行捐赠压力时,企业更可能是出于遵守行业规范需求被动捐赠,而非受儒家文化熏陶主动捐赠,即同行压力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企业慈善捐赠的影响<sup>①</sup>。同理,晏艳阳等<sup>②</sup>已经证实了家庭社会捐赠存在“邻里效应”,那么对于家庭而言,“邻里效应”在“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中会起到调节作用吗?参照现有文献<sup>③</sup>,本文将邻里效应(peer\_donation)定义为:除家庭*i*之外,社区*c*内其他家庭在*t*年的平均社会捐赠支出水平。计算过程如公式(3)所示:

$$peer\_donation = \frac{\sum_{N_i^c} Donate\_sum_{it}^c - Donate\_sum_{it}^c}{N_i^c - 1} \quad (3)$$

其中, $N_i^c$ 表示*t*年同一社区*c*内的家庭总数, $\sum_{N_i^c} Donate\_sum_{it}^c$ 表示*t*年同一个社区*c*内的所有家庭社会捐赠支出总金额; $Donate\_sum_{it}^c$ 表示社区*c*内的家庭*i*在*t*年的社会捐赠支出金额。进一步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儒家文化与邻里效应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儒家文化与邻里效应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邻里效应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这与徐细雄等<sup>④</sup>的研究不谋而合。

3. 对外开放程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其他国家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念纷纷传入中国,人们的思想观念、利益需求和行为方式不断多元化,而不同文化之间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也有所不同。那么,对外开放程度是否会弱化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呢?借鉴朱华友和王文鹏<sup>⑤</sup>的做法,本文采用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作为对外开放程度(openness)的代理指标,并在回归方程中引入儒家文化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儒家文化与对外开放程度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对外开放程度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

## 五、进一步讨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sup>⑥</sup>,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sup>⑦</sup>。诚如前文所述,发展慈善事业体现了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与救助,有助于推动资源和财富流向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起到平衡地区差异、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sup>⑧</sup>。那么,儒家文化是否能够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证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而且为中国特色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提供了参考。

① 徐细雄、龙志能、李万利:《儒家文化与企业慈善捐赠》,《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2期。

② 晏艳阳、邓嘉宜、文丹艳:《邻里效应对家庭社会捐赠活动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经济动态》2017年第2期。

③ 周翠俭、刘一伟:《共同富裕背景下居民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22年第1期。

④ 徐细雄、龙志能、李万利:《儒家文化与企业慈善捐赠》,《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年第2期。

⑤ 朱华友、王文鹏:《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5年第12期。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⑦ 雷雨亮、刘颜、刘辉:《数字经济、技能供需结构与收入差距:以中国流动人口为例》,《中国软科学》2023年第8期。

⑧ 韩文龙、唐湘:《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进路》,《经济纵横》2022年第4期。

借鉴沈兆林<sup>①</sup>的做法,本文基于家庭人均纯收入测算了城市层面的基尼系数,并将其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通过设定以下模型考察儒家文化对家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影响:

$$Inequality_{jt} = \alpha_3 + \beta_3 Confucian_j + \eta_p + \lambda_t + \epsilon_{jt3} \quad (4)$$

其中,  $Inequality_{jt}$  表示城市  $j$  在  $t$  年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用地区基尼系数度量,  $Confucian_j$  的估计系数  $\beta_3$  刻画了城市  $j$  的儒家文化浓厚程度对家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影响作用,其余变量定义与公式(1)相同<sup>②</sup>。表5的第(1)–(3)列汇报了(4)式的估计结果,回归结果表明,  $Confucian_j$  的估计系数始终显著为负,说明儒家文化显著降低了家庭面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促进了共同富裕。

表5 基尼系数回归结果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1)	(2)	(3)	(4)	(5)	(6)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i>Confu_temple</i>	-0.00464*** (-19.5395)			-0.00479*** (-19.9832)		
<i>Confu_temple</i> × <i>Donate_sum</i>				-0.00281*** (-3.0144)		
<i>Qing_scholar</i>		-0.00003*** (-8.3886)			-0.00003*** (-7.5941)	
<i>Qing_scholar</i> × <i>Donate_sum</i>					-0.00003*** (-2.6573)	
<i>Confu_academy</i>			-0.00006*** (-3.5739)			-0.00005*** (-2.8654)
<i>Confu_academy</i> × <i>Donate_sum</i>						-0.00033*** (-2.8451)
<i>Donate_sum</i>				0.01610*** (3.6561)	0.01274*** (3.3033)	0.02187*** (3.1916)
Constant	0.37035*** (170.0616)	0.36607*** (99.7162)	0.33973*** (219.7448)	0.37909*** (122.5821)	0.37235*** (86.0276)	0.34767*** (129.542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59820	59820	59820	54555	54555	54555
R-squared	0.4049	0.3991	0.3975	0.4031	0.3963	0.3949

本文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家庭社会捐赠支出是儒家文化缩小家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渠道吗?为了探究这一问题,在(4)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儒家文化与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的交互项:

$$Inequality_{jt} = \alpha_4 + \mu Confucian_j \times Donate\_sum_{jt} + \beta_4 Confucian_j + \delta Donate\_sum_{jt} + \gamma_4 Controls_{jt} + \eta_p + \lambda_t + \epsilon_{jt4} \quad (5)$$

交互项的估计系数  $\mu$  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如果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缩小了家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表5的第(4)–(6)列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与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儒家文化确实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缓解了家庭面临的收入分配差距程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验证了假说5。

① 沈兆林:《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质量——基于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应》,《宏观质量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因为式(5)是地区层面的回归,所以回归时不再引入家庭和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慈善正在成为促进社会公平、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鉴于鲜有文献基于中国的微观数据探讨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家庭社会捐赠以及共同富裕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使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各城市孔庙数量、清代进士人数和儒家书院数量来衡量当地儒家文化浓厚程度,系统探究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以及共同富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1)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了家庭社会捐赠倾向并扩大了家庭社会捐赠规模。(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儒家文化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家国情怀促进家庭社会捐赠。(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不同户主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4)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贫富差距大会强化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而邻里效应和对外开放程度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5)进一步研究发现,儒家文化通过促进家庭社会捐赠支出进而缓解了收入不平等程度、促进了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的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大力弘扬儒家文化、传承儒家思想精髓、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促进家庭社会捐赠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大力弘扬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同当代中国实践相适应、同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方可有效促进家庭社会捐赠,为实现共同富裕保驾护航。第二,积极提升普惠金融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充分发挥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和共同富裕的可靠保障。应当切实提高普惠金融覆盖率与可得性,统筹推动“三农”“扶贫”“小微”“双创”四大领域工作齐头并进。在稳步扩大普惠金融覆盖面、逐步提升普惠薄弱领域支持度、为普惠金融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正能量和新动力的过程中最大化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第三,积极孵化培育慈善组织、更有效地汇集多方慈善力量,是充分发挥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和共同富裕的有力手段。推动公益慈善组织向基层延伸,扩大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覆盖范围,建设“百姓慈善”的基层群众志愿队伍,努力实现“百姓慈善、慈善百姓”的良性循环。积极推进慈善事业发展、有效汇集多方慈善力量,有助于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促进作用,并为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积极贡献。第四,不断提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加速实现我国国民健康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是充分发挥儒家文化促进家庭社会捐赠和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一方面,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积极发展多层次医保体系,发挥商业健康保险在减轻群众医疗费用负担上的积极作用,提高保障水平和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并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持续提升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推动医保事业和养老保险事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尽可能地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对家庭社会捐赠的促进作用,助力共同富裕建设。

### Confucian Culture,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Liu Kaihao<sup>1,2</sup> Wang Xuefang<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P.R.China;

2. Free Trade Zon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P.R.China)

**Abstract:** Few relevant studies focus on the way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affect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micro-data from China,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micro-data of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from 2010 to 2020, employing the number of Confucian temple, *Jinshi* in Qing Dynasty, and Confucian academy at the city level, which are complementary with each other, to measure the local prevale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effe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Primary findings are as following: Firstly, Confuc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promote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indicating that Confucian culture increase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propensity and enlarge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scale. Moreover, the coefficients of interest remain robust after various tests, including using alternative measures, controlling the potential interference from local other cultural trait, replacing the research sampl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placebo test, etc. Secondly,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analysis find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promote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through the channel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feelings of belonging to the nation. Thirdly, the heterogeneity test indicates that the impacts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re heterogeneou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kinds of household. Fourthly, moderating effect test shows that dispar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strength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while neighborhood effect and the level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eaken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Fifthly, further study indicate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degree of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motes common prosperity by promoting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Finally, based on primary findings, we bring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vigorously promoting Confucian culture,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cubating and cultivating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the coverage of medical insuranc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 of this article are manifold: Firstly, 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propensity and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scal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proves the rol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affecting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micro-evidence supplements empirical studies concerning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proves the substantial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as an informal institution, on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Secondly, the use of widely representative data of CFP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ongitudinal family panel data allow this paper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micro-mechanism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affect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to reveal three effective paths through which Confucian culture affects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family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that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Most of the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household allocation of risky assets. This paper extends and supplements th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Confucian culture on househol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including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propensity and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scale). Fourthly, this paper proves that Confucian culture could both promote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and reduce the income inequality, revealing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 cultur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Confucian culture; Household social donation; Common prosperity

[责任编辑:王苏苏]